

# 播植台灣教育根基的教育家

——劉真

(訪問及資料整理：劉春榮、簡惠閔、陳怡親)

## 壹、生平簡介

劉真先生，字白如，安徽鳳臺人，民國二年生。劉校長是我國數十年來，具有教育智慧與卓見的教育家，他的青年時代經歷戰亂與顛沛，因而孕育出無私的大愛。秉持這種大愛的精神，一生奉獻教育，功在國家，重視人文教育，培養學生誠正勤樸的品格，不斷地為台灣教育做努力。因此，在民國七十八年，獲頒行政院中華民國文化獎，以表彰其對教育文化的卓越貢獻。

目前劉校長雖已是九十二歲高壽，仍致力於教育文化工作，現任中國語文月刊發行人、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以及「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長一職，持續為教育文化工作奉獻其心力。

## 學歷

民國二十四年於安徽大學哲學教育系畢業

民國二十四年年赴日本東京高等教育師範研究，民國二十六年中日戰爭爆發返國，民國四十二年赴美國賓州大學從事教育研究一年，連同在日本東京高師研究，共為期三年。

## 經歷

民國三十七年擔任立法委員。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十日至民國四十六年八月間擔任台北市立師範學院院長，民國四十四年六月五日師院改制為臺灣師範大學後，繼續擔任校長（即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民國四十六年擔任臺灣省教育廳廳長，至民國五十一年十二月交卸教育廳廳長之職。

民國五十二年至八十一年於國立政治大學授課，擔任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

民國五十六年起擔任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委員兼文化組主任，共長達二十四年。

民國七十八年擔任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民國八十一年擔任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 座右銘

#### 有愛無恨

劉真校長的座右銘是有愛無恨，對任何人都秉持著愛與寬容，以這樣的精神對待週遭的人事物，這樣的胸懷相當令人感佩。在現今紛紛擾擾的社會中，這樣的精神更是值得我們學習。

### 貳、生平際遇與重要事蹟

---

初見劉校長，感佩之意溢於心中，那種氣度與笑容，在在展現出教育家的慈愛。劉真校長爽朗健談地與我們分享他的生平經歷與教育行政歷練經驗，訪問完後還與我們在他親手寫的書法「行者常至、為者常成」前合照，並和我們握手、不斷勉勵我們要認真做人做事，讓我們見識到一個大教育家及政治家的風範。

劉真校長首先和我們談論到他的生平及際遇，繼而說到他從事教育工作中的經歷。在一連串的說明後，我們可以瞭解做出一個教育政策背後隱含的思維與熱忱，更讓人深刻的體驗到教育是一種神聖奉獻的精神事業。以下就劉廳長的生平與重要事蹟分別做一說明。

### 參、以勤補拙、以誠取信的青年時代

---

「從小我就是在充滿教育與宗教的家庭環境下成長，因為我的父親在我的家鄉—鳳臺—創辦了一所小學，我的父親一生熱心教育，學校經費一有問題時，他總是變賣家產來補助學校；同時，他也是為虔誠的天主教徒，經常向人傳布天主教教義。」

「我的第一位啓蒙老師是父親，他由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等書籍開始教我。慢慢進入孝經、論語、孟子、古文觀止等書，這些過程奠定我未來的語文基礎與興趣。」

「在民國十四年，我開始進入中學就讀後，豫東魯西一帶就不斷有戰禍發生，我的初中時期也在停課多、上課少的情形下結束，在停課時間，我便在家中自習，這時期在父親的引導下，我開始研讀爾雅與說文等書。」

「在這段戰禍頻頻的時期，我又不幸的腿部生瘡，約有半年之久，我都躺在床上，無法外出。心中感到相當的迷惘與痛苦，還好那時父親爲我請來一位老師教我老莊、史記、漢書及昭明文選等著名文學作品。現在想起來，臥病在床的期間，奠定我的國學基礎與寫作能力。所以，我想告訴現代的年輕人：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困境中要堅持努力，不要消極悲觀。不斷的努力與蓄積，往往可以得到意外的收穫。」

「民國十八年，我以中學肄業證明書考取了安徽大學預科，後二年，我進入文學院的『教育哲學系』就讀，會選擇這一科系，是由於我認爲教育與哲學的關係最爲密切，因爲教育是哲學理念的實踐，這大學四年對我未來的教育生涯做了良好的奠基工作。」

「民國二十四年夏天，我自安徽大學畢業後不久，即前往日本考入東京高等師範教育研究科，主修心理學。在這一過程中，除了教育專業上的學習，在外語能力上亦有所進步。在日本留學的期間，經濟上相當拮据，我以投稿、家教來賺取學費與生活費。經過這次留學過程，我更堅信決心與勇氣，努力堅持一定能克服困難，達到目的。」

「我常以我青年時代的生活和年輕人分享。年輕人不必顧慮太多，躑躅不前，因爲只要你的目標光明正大，並能腳踏實地，盡其在我。即使遭遇挫折失敗，亦決不應消極沮喪。因爲年輕人來日方長，有許多重新開始的機會，這也是我常以「樂觀奮鬥」四字與青年朋友共勉的最大用意。」

和劉真校長一段談話下來，他以堅毅的神情訴說著屬於他的青年時代。除了瞭解那時讀書的辛勞與戰爭的顛沛流離外，更叫我們感動的是：劉老師爲理想而堅持的勇氣與努力，不禁讓我們感嘆：有爲者當如是。

## 肆、從事教育行政工作的歷程—從台灣師院、師大到教育廳

「在一個動亂的時代背景下，我卻十分幸運的在台灣連續擔任教育行政工作達

十四年之久。這段過程讓我覺得在社會上服務，正如爬山一樣。我想把這些經驗跟你們分享，因為爬山的人不一定每一位都能到達頂峰，但是若能把所經歷過的途程告訴以後爬山的人，那便會使以後爬山的人多少節省一點摸索的氣力。」

「這樣，一個人今天的失敗，可能是另一個人明天的成功。」

「社會上任何一方面的成就，都是前人一點一滴不斷努力所累積的結果。即使在失敗的累積中，也往往奠下成功的基礎。教育是國家百年大計，這種累積更屬必要。現在我就將我過去所累積的經歷做一扼要敘述。」

### 伍、在台灣師院服務

---

「我在台灣教育界服務，是從民國三十八年四月開始的。」

「當時我是立法委員，一天，突然接到台灣省政府的電報，要我立刻到台灣來。」

「因為當時省立師範學院正在鬧學潮。因為省府希望讓學校趕快復課，於是我便在毫無準備的情形下匆促接下這一職務。」

「那時省立師範學院的學潮，我們稱之為四六事件。處理學潮的過程中，我秉持著我的座右銘從『有愛無恨』的原則來處理，沒有解聘任何一位教職員、沒有開除任何學生，因為我相信只有愛，社會才能安定。學潮時，學生曾經毆打憲警，為了保護學校人員安全，政府在學校四周佈置憲警人員。我認為這樣的措施不妥當，便向警備副司令彭孟緝表示：千萬不要在師院四周佈憲警人員，本著相信學生的態度，終於在兩個多月後，圓滿解決了轟動一時的『四六學潮』。」

「學潮解決後，我便開始建設學校。當時師院是沒有自己的校地，為解決這一問題，我便將臺北高中在當年暑期結束（當時省立師範學院與臺北高中共用一校地），以便師院能好好利用這所校舍。即使如此，師院校地仍過於狹隘，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問題，若不解決的話，省立師院便永遠沒有發展的希望。很幸運地，在師院對面的一大片稻田恰巧是公產，我馬上帶著公文與地籍圖到省政府向陳主席報告，得到陳主席的贊同，而終於解決了校地過隘的困境。」

「接下來便是聘請教授與修建宿舍兩工作了。我認為要聘請最好的教授來滿足學生的求知欲，像牟宗三、陳大齊、梁實秋、楊亮功、田培林、劉季洪、沙學浚等人都應聘來校任教。之後，我調動了九個系的系主任，我認為系主任很重要，有了好的系主任，才能聘到好的教授。我請這些名教授來師院任教，中華日報社社長盧冠群先生還問我：「這些大教授你能伺候得了嗎？」我說愈是好的教授愈容易相

處，他們專心研究與教學，對學生是最有益的。學校對教授最重要的是禮貌與尊敬，相信教授都會願意與學校密切合作的。」

「其次，關於修建學生宿舍的問題。當時許多在教育界有聲望的長輩見我積極準備建校舍，都略有微詞，表示要我審慎考慮。因為他們認為大學生住宿舍，容易聚眾滋事，過去大陸常有學生在宿舍議論校務，遇有不平，便發起學運。尤其當時師院剛發生學潮，學生心理較為浮動，實在不宜興建宿舍給學生聚眾的機會。當時我究竟年歲較輕，脫離學生生活環境較短，恰對學生心理與思想瞭解較為清楚。我認為學校領導學生不應以消極防範為主，採取積極的辦法才是上策。為了學校的安定，必須先使學生生活安定、飲食起居方便，如此一來學校自然會在安定中不斷進步。師院有了學生宿舍後，學生大都住校，我同時規定住校生每日須參加升旗典禮與健身運動，而我擔任校長期間，沒有一天不到校主持朝會與升旗典禮的，因為我認為身教是最重要的。跟你們分享一件趣事，當時我擔任省立台北師院校長時，有天下大雨了，學生都猜校長不會來，但是校長還是風雨無阻的準時參加升旗典禮，讓學生相當佩服。因此，教師以身作則很重要，要實事求是，不能光講口號。我想要提醒未來要當教師的人，我觀察到今日很多中小學教師的程度不錯，但是，很可惜的是：不愛唸書，沒有做到以身作則的基本功夫，當老師的人教育別人先要教育自己；要學生唸書、自己也要喜歡唸書，為人師者一定要謹記『以身作則』的重要。」

「在學校運作一切漸漸上軌道之後，我開始思考到師院由於學校成立歷史較短，沒有校慶，也沒有校訓。為指導學生品格修養與樹立優良校風，民國四十年，我特別選定『誠、正、勤、樸』四個字做為師院的校訓。我曾經就此四字校訓對學生做解釋，所謂『誠』就是『不虛偽』、『不欺枉』；『正』就是『不偏私』、『不枉曲』；『勤』就是『不怠惰』、『不因循』；『樸』就是『不奢靡』、『不浮華』。我認為如果大家能夠做到誠正勤樸的校訓，便不難實踐禮義廉恥的共同校訓了。」

「此外，在師院期間，我認為還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訂九月二十八日為教師節。記得在民國三十九年八月時，師院舉行教師節慶祝酒會。我在致詞中，曾經表示每年八月二十七日為國定教師節，但此時由於正值暑假期間，師生聚會不易，勉強舉行慶祝會，實在是有失尊敬教師的本意。當時在座一位對曆法有研究的國文系陳發軔教授指出：政府於民國二十三年所公布的國曆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誕辰，但是根據曆法推算，乃是國曆的九月二十八日才是正確的孔子誕辰。陳發軔教授同時把精確的考證向會場同仁說明，請我以師院院長身分將曆法改正。有些同仁認為茲

事體大，不宜冒然提議。我向同仁表示，只要考證是正確的，就應該向中央建議。於是，我們便向教育部呈請核辦，後教育部又轉報行政院，行政院請董作賓與高平子等曆法專家共同考證，大家都認為陳發軔教授的考證是正確的，最後，行政院會通過，在民國四十一年一月明令公布：以九月二十八日為孔子誕辰及教師節。我認為這也是我在師院期間所做的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

「回想起來，我在師院（今師大）服務的八、九年中，學校的客觀條件固然相當困難，但當時由於大家的團結合作，好像從來就沒有困難的感覺。尤其時間久了，自己和學校中好像產生一種分解不開的感情，彷彿學校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常感覺到，在師院與師大這一段時間，可以說是我前半生中最愉快的一段生活。許多我以往所仰慕和從不認識的教育前輩和學者，都因為共事關係，成為忘年之交與莫逆之交。」

聽著劉真校長對省立師院建設的用心，對學校經營的努力不懈、對學生品格陶冶的重視，方造就今日臺灣師範大學在師資培育上的卓然地位。「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今日臺灣師範大學有健全的師資培育體系，都要感謝劉老師的擘畫。

### 陸、在教育廳服務

.....

「民國四十六年八月，教育部張部長打電話給我，說省政府新主席周至柔先生向他表示，要請我擔任教育廳廳長。我當時深感意外，便在電話中懇切地向張部長表示：以我能力、經驗與志向，都不能接受這一新職務，請他將我的意思轉達周主席。張部長回覆我說，他恐怕不能代我向周主席拒絕，最好是我自己向周主席說明。在與周主席說明後，他說願意將我的意見轉報中央，只要中央同意我個人的請求，他絕不勉強我擔任我不願意擔任的工作。當天下午，我以口頭與書面向中央決策當局，說明我不能擔任教育廳廳長一職的原因，請他們諒解，不要決定這一項人事的任命。這一天，真可說是我多年來精神上最感沉重的一天。」

「結果沒想到，兩天後的中央決策會議，還是決定了我要擔任教育廳廳長一職。我不得不離開我所敬愛的師大同仁與同學，開始我的從政生活。」

「當時的我很不願意從事教育廳廳長一職，我學教育的志願是在於教書與辦學，尤其在師大服務多年，對於要離開苦心經營的事業，心中有百般不願。」

「最後，教育部部長張曉峰先生與考選部部長陳雪屏先生兩人都向我說：教育廳的業務固然繁重，如果用心努力去做，也許比辦一間大學更能造福大眾。幾經思考後，我開始承擔這個從未預料到的工作。」

## 一、創立教師福利制度

劉校長很令人稱道的是：對於教師福利的重視。所以這麼重視教師的福利，探究其原因是受到其家庭環境的影響。劉校長回憶到：父親的職業是教師，因為以往對於教師福利的忽略，因此劉校長的童年生活是相當樸實的。這樣的生活經驗讓劉校長一上任教育廳廳長，即開始推動教師福利制度。

「我接任廳長後，即向省政府周至柔主席表示：教育廳首先要做的事情為改善中小學教師待遇。如果教師的待遇無法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怎能要求他們專心教學？這樣的看法得到周主席的贊同。經由研議討論後，決定發給教師新台幣一百元的研究費。當時的小學教師待遇才三百元，等於是提高了三分之一的待遇。我記得那時恰值颱風過境，為了爭取這項教師福利，我在風雨中，由教育廳在霧峰趕至中興新村往返奔波，最後提案終於通過，覺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很值得的。」

「繼而，在民國四十八年四月間成立『臺灣省公立中小學教職員福利金籌集委員會』的組織，積極為教師謀福利。福利會首先舉辦助學貸款，凡中小學教師、職員、工友子女就讀大專院校者，每年均可貸助學金三千元，規定於畢業後，分六年無息償還。」

「另外，我又改訂教師兼課辦法、增加導師職務加給費、健全退休補助金制度等。有一次我到省立嘉義中學視察時，多位大陸來台的教師向我表示：因為教師待遇偏低，所以同事的禮金是一項很大的負擔。同時，自己隻身來台，倘若不幸病逝，更沒錢辦理後事。聽了這番話，我認為這個問題很值得重視。回教育廳後，便訂定『省立中等學校教職員婚喪互助辦法』，結婚互助旨在提倡節約，以消除送禮宴客、鋪張浪費的積習；喪亡互助旨在推己愛人，惠及孤寡，以發揮教育人員患難相扶持的精神。」

「福利會另一項重要措施便是興建『教師會館』。當時台灣名勝以日月潭最著名，許多人到此遊覽。許多教師也至此地遊玩，但由於薪水低住不起旅館，往往要一天往返，相當辛苦。所以，我們決定興建教師會館，藉著教師會館的建立作為提升教師地位的一種象徵。」

「經過當時教育界同仁的支持與共同努力擘畫，終於建立起我國教師福利制度，我認為這是教育界的一個大進步。」

## 二、初中入學考試免試常識的推動

「在我擔任教育廳廳長時，有一件頗受爭議的措施，那就是初中入學考試免試『常識』一科。以往在初中入學考試時，學生須考國語、算術、常識三科。因為入

學考試的競爭，當時惡性補習的情形很嚴重，家長與民意代表為維護學童的身心健康，均要求教育廳要減低惡性補習的風氣。我基於教育的觀點，也認為初中入學考試科目不宜過多，因此若能取消常識一科的考試，相信對於學生惡性補習的風氣能有所消除。」

「選定不考『常識』一科的原因，是由於常識類的課本共有十六冊之多。學生由於內容龐雜繁多，往往不得不死記書中之人名地名與年代等。這些機械性記憶的背誦，費時耗力，又極易遺忘。另外，一般教師切望學生能順利升學，對該科的教學方法僅採取填鴨的方式，要求學生反覆背誦課本上的知識，完全未依據實際教學目標來實施教學。這樣的措施構想得到許多教育專家與中小學教師的贊同，因為國語與算術屬於工具學科，常識是內容學科，入學考試應該側重工具學科能力的培養，常識科目入國中後均須一一學起，因此，就中等教育方面而言，免試『常識』一科，並不會違背入學考試的目標。」

「免試常識一科，在理論上是站得住的，但是仍有些民意代表公開質詢。探究其原因是由於很多書局在常識免試後，他們出版的常識補充教材便銷售不了，因此，便委請民意代表出面質詢。最後，幸賴總統與各方人士的支持才使這新政策得以順利推行。」

### 三、創辦實用技藝訓練中心

「我一到教育廳服務時，便曾接獲『改進國民教育』、『發展職業教育』、『充實高等教育』為今後台灣省教育施政重點。」

「在發展職業教育方面，深感職業教育缺乏彈性，不切實際，因此，思考如何不受現行職業教育法令規章之限制，另行開闢一條職業訓練之途徑。在民國四十七年，我特別提出實用技藝中心的名稱，並說明名為『訓練中心』，可以不受現行職業教育法的限制；名為『實用技藝』，即指出係訓練內容注重技術而不專重理論。我這個想法的目的是想要訓練在職青年與成人提高其技藝水準及教導其學習別種技藝，使其增加生產技能或便於轉換行業。在實施方法方面，重視的是社會需要，即視當時社會需要來辦理，且上課是有彈性的，並以建教合作的方式輔導就業。」

「實用技藝訓練中心在民國四十七年二月創辦以來，至五十一年十一月底止，全省已有四十餘所學校設置訓練中心。一般青年參加受訓者極為踴躍，每年約有五千名學生結業，且就業率達百分之八十，可以說為補習與職業教育開闢了另一新途徑。」

聽完劉校長的教育構想與實現過程，深深感受到前人的每一步一腳印為我們後代



所創造的無限福祉。做爲一個教育家必須要有劉校長的奉獻精神與高瞻遠矚的胸懷。

#### 四、倡導人文教育與重視語文教育

「倡導人文教育是我從事教書、辦學與行政工作這四十多年來一貫努力的目標。我所指的人文，即所有關於『人』的問題，所偏重的是精神層面，大抵涵蓋了文學、哲學、歷史與美學等方面的教育。我之所以特別倡導『人文教育』乃是對於社會演變下的一種使命感，以往過於重視科學與科技教育，而忽略了在心靈層面的人文教育。這樣重視科學的風氣之下，往往學生的品格與道德教育是受忽略的部分，也造成社會風氣日益萎靡的負面影響。」

「重視語文教育是由於語文是一種基礎學科、是工具學科，而不是學問，若是基礎工具都沒有一定程度，如何做學問呢？強調語文教育的重要是：因當時學生的語文程度嚴重，我記得曾有位學生寫信給我，信封上寫著『○○○老師敬啓』，要老師恭恭敬敬的將他寫的信打開。這種工具學科沒有學好一定會鬧出許多笑話，做爲一個現代人一定要提醒自己要注意語文程度方面的加強。」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我擔任臺灣師範學院院長，鑑於師範學院是培養師資之所，教師必須是一位人格健全的人，方能爲人師表。因此除了當時教育部所規定的課程以外，我利用課外時間，特別加強學生人文科目的教學。」

「舉例來說，我在師範學院設立了國學講座，請當時國文系主任潘重規主持，專門爲學生講說四書五經。台灣的歷史背景是曾受日本殖民教育五十年，因此，本省學生對於中國歷史與文化的了解有限。設立國學講座的目的是在於希望師範生能多多接觸國學，進而了解中華文化的淵源。同時我認爲歷史也是很重要的，特別請陳致平教授，以講故事的方式講述中國歷史，從古代一直講到現代的歷史，連續講了三年之久。哲學方面，則由牟宗三教授主講。以這些方式來推廣人文教育。」

「師範學院同時也成立了人文學社，這個學社是由教授、學生聯合組成，一直到現在還是師大重要社團之一。還來師大校友會成立了『劉真先生學術基金會』，這個基金會定時舉行人文講座，來推廣人文教育。回想我三十八年舉辦這些講座時，有些人還批評我宣揚儒家思想是開倒車的行爲，直到後來蔣公倡導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與孔孟學會，大家才不再認爲推行人文儒家思想是違背時代潮流。」

「另外，我在語文教育方面，也對教育部規定的國文課程做一番調整。本來大學國文只僅教學一年，但是我認爲一年不夠，便將國文增加一年，而且採分組教

學。因為國文課程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寫作，教授更要認真批改，因此，將國文課程採取程度分組的小班制，老師教起來容易，作文批改也方便。國文與國語是最基礎的工具學科，所以，每一學期舉行一次測驗，不及格者仍需努力，參加下一學期的測驗，倘若四年大學讀完仍不及格者不得畢業。每一學期終了，將學生的作文簿公開陳列，了解學生的作文程度，間接的考核教授是否有用心批改。在我擔任師範學校校長期間，學生的國文程度大致上都不錯。此外，我也鼓勵學生參加各種考試，以測試自己的程度。師範學院設有國語評審委員會，因為師範生畢業教書必須用國語來教學。我希望全校的畢業生都用國語來教學，國文系的學生除了能教國文以外，也能教國語。英文系的學生除了主修英文以外，也需輔修國文系課程，因為單單只有英文好而國文不好的話，將來在教學語言課程上，都很難有優良的成就與表現。畢竟國文與外文都是一種工具，所以應該在學生時代就打好基礎，後來很多學生在社會服務或擔任大學教授，都對我說，我們有很好的國文與外文能力都是我當校長時逼出來的。」

「我到教育廳服務後，就規定師範學校定時舉行國文與國語統一考試，以提高師範生的國文程度，規定師範生結業時必須參加由教育廳統一命題的國語文考試，不及格者不予分發擔任小學教師。很多學生知道有這項規定後，都很緊張，很怕會考不及格。例如：現在政大國文系教授李威熊就說，他當時正在台中師範學校就讀，知道有這項規定，心理上有很大的壓力，不得不加緊努力學習國文。但是如今回想起來，若沒有這項規定他們就不會重視國文，一旦重視後，開始鑽研後便發生興趣，也使得他後來走上研究國學之路。」

「經過這一連串的政策實施經驗，我認為政府的政策只要是對的就應該要認真執行，不要顧慮太多外界的批評，我始終認為師範生如果國文程度太差，如何能做一位稱職的教師呢？學生在青年時期如果能把語文工具打好基礎，將來從事任何工作都不會遭到運用文字的困難。我仍要期勉未來將要為人師者，好好打好語文基礎，這是做一位教師基本必備的條件。」

## 柒、主持中國學制改革工作

.....

「民國七十二年四月間，有一天中午，我與教育部次長施金池共進午餐，他告訴我，下午教育部有一場會議，朱匯森部長希望我一定要參加。那幾年教育部的會議很多，因為我認為教育問題錯綜複雜，各方面意見是見仁見智，所以往往發生爭論，結果都是以議而不決，或是決而不行收場。之後，有關教育方面的會議，我總

盡量避免參加，以免浪費時間。但是，這一次由於施次長是師大校友，奉朱匯森部長之命相邀，於是我下午便準時到教育部開會。」

「朱部長表示教育部欲成立一個『學制改革研究小組』，希望在座者均能應聘為小組委員，不過為便於工作進行，必須先推定一位召集人。當時朱部長和應邀出席者一致推定我為召集人，我以種種理由再三婉辭，朱部長與其他與會人士認為學制改革關係重大，我思考後允任為召集人。」

「我從不輕易接受一個新工作，只要我答應接受新工作後，必定全心投入，負責到底。第一次開會時，為『正名』起見，我即提出國人翻譯外國術語，常多歧異，應加以統一。學校制度當時有學者翻譯為『學校系統』、『學制系統』、『學校制度』、『學制』等，我期望將名稱統一。並說明學制，乃是國家對於一般未成熟的兒童與青年實施各種教育時所劃分之確定的學習進行階段。這些以年度為單位的學習階段，上下左右協接聯繫起來，便構成一個完整的學校系統，亦即所謂學制。大家均同意我的看法，於是我們便將這個研究小組定名為『學制改革研究小組』。」

「我國的新式學校制度始於前清末期，當時列強侵陵，國勢危急，於是朝野上下均認為唯有廢科舉、興學校，始可救亡圖存，因此，慌亂之中開始了新式學制，採取了『六三三四制』，此一學制完全仿自美國，加上實施時未能發揮此制的原先基本精神，以致衍生許多缺失。胡適、梁漱溟、傅斯年等學者都曾提出該學制缺失，期望能發展出中國本位的學制。」

「學制研究小組討論後，歸納出現行學制需要加以改進的部分有：幼兒教育的質與量均不足、國民教育重視升學忽略教育目標、高中以升大學為主，但是許多高中學校均無學生考進大學、職業教育未納入學制、推廣教育缺乏、大學修業年限缺乏彈性、師資培育制度應加強、全民教育與終身教育的目標要繼續加強。」

「學制研究小組認為現行學校制度與社會需要有脫節之處，應該予以改進，教育是百年大計，所以有關學制改革的建議，需特別考慮到以下幾點：可行性、前瞻性，並且希望改革後的學制具備：創新的精神與彈性的制度。」

「經過多次的討論，商訂出十項改革原則如下：

- (一) 學校制度應按學校性質，以『幼兒教育』、『國民教育』、『技藝教育』、『學術教育』、『師範教育』、『社會教育』、『特殊教育』等，作為分類的依據。
- (二) 學制應採取『單軌多支』的型態。
- (三) 各類教育規劃，應配合國家人力供需計畫，以提高教育投資的效益。
- (四) 各類學校制度的訂定，應根據『創新』、『彈性』的原則做多元化的規劃。

- (五) 學制需力求『上下銜接』、『相互溝通』的便利。
- (六) 師資與專業人員養成與進修制度的建立，以適應社會進化的需要。
- (七) 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應做密切配合，以實現『整體教育』、『終身教育』的理想。
- (八) 特殊教育在各類各級學校方面應有制度與課程上妥善規劃。
- (九) 幼兒教育與成人教育，應分別建立制度，並與各級學校教育密切聯繫。
- (十) 各類學校修業年限與課程內容應參考世界教育的趨勢，不斷做調整與修訂。」

「學制研究小組根據以上原則，在民國七十三年四月規劃出學制改革方案，朱部長完全同意，後提報行政院核定，那知適逢行政院人事改組，因此這個學制未能形成政策，以付諸實施。」

「學制問題只是整個教育問題的一環，在為期一年的小組討論中，小組委員均按時參加會議，各抒己見，達成共識，完成一套具體的學制改革方針。雖未能見諸實施，但仍出版『中國學制改革之研究』一專書，可供後學參考與研究。」

劉校長在學制改革研究小組中所提出的學制問題與改進原則，現在看來，仍是相當適合解決我國當下的學制問題。不禁對改革小組對我國學制改進研究之用心，雖然未能實施落實，亦不能不對學制改革小組的用心與高瞻遠矚表示由衷的敬意。

「分享完我少年時代的讀書過程、教育行政的經歷，最後，我要期勉現代的年輕人五個人生原則：用功做事、用功做學問、不講空話、實事求是、以身作則。秉持著這樣的精神去經營你的人生，相信回首時，你會肯定自己曾做過的一切努力。」

## 捌、後記

.....

訪談劉校長的過程中，對於劉校長的氣度與笑容，在在展現出教育家的慈愛與智慧。在從事教學與教育行政的過程中，這樣的慈愛與智慧，引領著我國教育發展邁向成熟與進步。相信劉校長對於教育事物的盡心與奉獻，永遠是教育界的最佳典範。